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参考

第7号（总199号）

2015年6月8日

国际智库关于亚投行的评论与建议

内容摘要：2015年5月12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召开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前景、挑战与对策”国际视频会，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英国查塔姆研究所、韩国对外开发研究院等多家机构的专家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展望。本期报告为视频会的专家观点综述，供参考。

关键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治理；区域经济发展

国际智库关于亚投行的评论与建议

一、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潜在影响的分析

专家普遍认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立的必要性。亚洲地区面临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资金缺口，现有多边发展机构可提供的融资规模有限，也存在着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亚投行的成立恰逢其时。韩国开发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院教授林源赫（Wonhyuk Lim）认为，亚投行的另一职能是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再平衡的政策工具，和“一带一路”战略都有助于增强中国与邻国之间的联系。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宝拉·苏巴基（Paola Subacchi）则认为，应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而不是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亚投行，中国只是号召一些国家来应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

亚投行的建立有助于加快中国和亚洲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对消除区域不平衡发展有积极作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执行副总裁平冢大祐（Hiratsuka Daisuke）认为，亚投行可以持续地把资金引向区域经济体中的不发达地区，促进其经济发展，从而为相关区域带来平等发展的机会。以缅甸即将设立的皎漂经济特区¹为例，除缅甸和中国边境地区外，中国内陆也有可能从中获益。林源赫也指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帮助创造需求、加快市场整合一体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博森（Adam Posen）认为，亚投行用人民币贷款可加快中国本地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在短期内会有积极作用。如亚投行管理得当，会有助于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正外部性，但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影响有限。平冢大祐认为，互联互通会增加亚洲和欧洲间的贸易量，欧洲也将从中受益。苏巴基也表示，来自中国的资金对保持伦敦这一金融中心的活力十分重要，这也是英国加入亚投行的重要原因。她进一步指出，亚投行作为区域性银行，资本规模小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项目选择上应优先亚洲地区，因此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整体影响有限。

¹ 该经济特区连通了皎漂（缅甸于安达曼海的海港）—木姐（缅甸的中国边境城市）—瑞丽（中国的缅甸边境城市）这一中缅边境带状区域。

二、美日两国对亚投行的态度

多数专家认为，美国需要逐步转变对亚投行的态度。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称，美方的反应是一个外交错误。在亚投行的讨论初期，美国没有给予一定的重视。待各国对亚投行的意见初步统一并成熟后，美国的反应缺乏足够的协调，从而陷入被动。他认为，美方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调整立场，但在未来有望加入亚投行。博森指出，美国阻止其他国家参与亚投行，使英国处境尴尬。他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的态度并非针对中国，而是迫于美国国会的压力，必须表现出“对中国立场强硬”，所以，不要把无能和恶意混为一谈。

日本对亚投行还处于观望态度。平冢大祐介绍，日本怀疑亚投行能否很好地发挥国际多边机构的职责，还需观察其在具体运行上的表现。苏巴基认为，如美方态度有所松动，日方也会转变态度。要改变现状，亚投行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多边发展银行，而非中国一手创办的针对美日的机构，这点应当反映在亚投行治理之中。

三、亚投行发展展望与建议

1、亚投行在确立治理结构时需兼顾公平、公开和效率的原则

多位专家表示，亚投行在确立其治理结构时，需要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平衡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注重机构运行的效率。林源赫和苏巴基建议采用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并行的双层治理结构，以达到监督制衡的作用。而曾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的杜大伟则认为，鉴于现有国际开发机构内部多层治理结构导致指令丧失连贯性、行事效率低下的教训，亚投行可考虑不设常驻董事会，赋予管理层更多决策权。即使设置董事会，也建议采用更高效的会议形式。

2、亚投行在选择项目时应以利润为导向，在执行过程中注意风险控制和绩效评估

苏巴基认为，以实现利润为目标，将有助于项目的顺利运行和可持续性，同时确保正确的治理结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与企业事务部副主管安德烈·拉波尔（André Laboul）补充道，亚投行在商业模式上有别于商业银行，需考虑社会和环境等更广泛的因素。应据

此确立一个相对较低的利润目标，执行成本效益分析。

拉波尔表示，良好的内部管理能力是亚投行搜集信息、开展工作、吸引私营投资者进行配套投资的前提。主管团队应有能力对投资情况进行设计、评估、监管和审查；在具体运营中，必须对负责项目的员工进行绩效评估，依靠内部或外部专家实施相关战略。

专家均认为，亚投行需加大风险防范力度，从而更好地配置资产。针对此，杜大伟建议亚投行参考现有国际开发机构在环境评估、项目关联的迁置政策、合理采购和财务标准以及独立评估等方面的经验。注意避免官僚化，提高效率。林源赫教授建议，亚投行在运作初期可选择购买在建项目的债务，支持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将为基础设施贷款方提供足够的流动资金，也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债券作为一种新型资产类别的发展。

3、亚投行需要处理好与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关系

苏巴基和博森认为，亚投行需避免对现有的多边银行采取对立态度，应积极展开合作。博森认为，亚投行关注以发展为目标的投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资金支持不同，亚投行的资金能够对现行的金融机构提供有效的补充，不会与其他长期借贷的提供者竞争，对其他体系不会造成负面影响。苏巴基建议，亚投行可以在亚洲地区加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多边对话，从而在区域层面发挥重大作用。杜大伟则表示，亚投行和现有多边发展银行之间合作与竞争共存。一方面，亚投行若想尽快启动项目，可以考虑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联合融资；另一方面，从长远看来，亚投行和这些银行之间也会产生竞争。他认为，在效率和成本上的良性竞争是有益的。亚投行的成功可加快现有多边发展银行的改革，并进一步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3、亚投行应加强与机构投资者的合作，推动其对长期投资项目的融资

苏巴基和拉波尔均提到，机构投资者和基础设施投资是理想匹配。前者管理着超过 90 万亿美元的资产，投资潜力巨大，且多为长期投资者，也会愿意认购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设计的金融工具。

根据经合组织的调查，大额养老基金资产达 20 万亿美元，而用

于基础设施方面的资产配置平均仅 1%。拉波尔认为，这说明机构投资者对投资基础设施的需求由于一系列障碍未能满足。目前机构投资者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障碍主要与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市场缺乏长期政治承诺，缺乏储备项目，市场分散，监管缺乏稳定性且竞标成本高昂。基础设施投资者能力缺乏，存在监管障碍和倾向短期盈利等问题。投资还受到条件限制，比如缺乏透明度，利益错配，缺乏数据等。亚投行可以鼓励机构投资者做长期投资，成为私营投资的催化剂，为私营投资者设定具有商业价值的投资方案：采用成本效益法、强调利润、具有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同时监管得当。苏巴基认为亚洲应为养老基金等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更多的长期投资机会。亚投行可以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合作投资亚欧边界上的项目，使得亚洲和欧洲同时受益。

4、在亚投行的管理和运营中，中国需要注意形象建设

多数专家表示，中国应该在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中发挥领导作用，但要避免垄断。需要兼顾其他股东的利益，分清股东责任，提供公平发言机会，采取民主的治理方式。苏巴基建议，作为亚投行的发起者，中国需要鼓励美国参加对话。博森指出，中国政府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亚投行项目中的参与实现一个乘数效应，但要注意避免造成公众与成员国的误解，认为亚投行是为中国本国服务的。杜大伟提醒，在舆论上应避免把亚投行、“一带一路”和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国内改革才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亚投行或“一带一路”只能作为一种补充，而不能替代国内改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陆玗璿 贾小可 整理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中心 A 座 15 层
电 话： (010) 64255855 邮 编： 100011
传 真： (010) 84080850 网 址： www.cdrf.org.cn
责任编辑： 任晶晶 电子邮箱： renjj@cdrf.org.cn
